

认知诗学视域下俄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分析 ——从《草原》到《第六病室》

孟欣欣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都 610068）

摘 要：

本文以认知诗学中的“可能世界”理论为主要切入点，通过分析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两部代表作品《草原》与《第六病室》，探讨了俄国知识分子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生存困境与思想挣扎。文章首先概述了知识分子主题在契诃夫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他如何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并引入“可能世界”理论来解读这些内心活动；接着，分析了《草原》《第六病室》两部作品中的情节连续性，揭示了在“可能世界”中《草原》与《第六病室》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是如何展现命运连续性的；最后，从“可能世界”的视角探讨了规训权力下社会的普遍惨案，揭示了这一时期俄国知识分子面临的严峻现实和无奈抗争，由文本中的“可能世界”转向现实世界。本文旨在通过对契诃夫作品的解读与对“可能世界”的阐释，进一步理解俄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生存状态与精神追求。

关键词：

认知诗学；可能世界；契诃夫；俄国知识分子；生存困境；《草原》；《第六病室》

Analysis of the Survival Dilemma of Russian Intellectu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oetics

—From *The Steppe* to *Ward No. 6*

Meng Xinxi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作者简介：孟欣欣，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俄国文学、德国文学研究。

Abstract:

Taking the theory of “possible worlds” in cognitive poetics as the main entry point, this paper analyzes two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Anton Pavlovich Chekhov, namely *The Steppe* and *Ward No. 6*, and explores the survival dilemma and ideological struggles of Russian intellectuals under the autocratic rule of the Tsar. Firstly, the article outlines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the theme of intellectuals in Chekhov’s creation and how he demonstrates the inner world of intellectuals through delicate writing, and introduces the theory of “possible worlds” to interpret these inner activities. Then, it analyzes the plot continuity of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two works from *The Steppe* to *Ward No. 6*, and reveals how the protagonists in the two works, *The Steppe* and *Ward No. 6*, obtain the continuity of fate in the “possible worlds”.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sible worlds”, it discusses the common tragedies in society under the disciplinary power, reveals the severe reality faced by Russian intellectuals during this period and their helpless struggles, and shifts from the “possible worlds” in the text to the real world. This paper aim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spiritual pursuits of Russian intellectuals under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s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ekhov’s works and the elaboration of “possible worlds”.

Key words:

cognitive poetics; possible worlds; Chekhov; Russian intellectuals; survival dilemma; *The Steppe*; *Ward No. 6*

0 引言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作为19世纪末俄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作品深刻反映了沙皇俄国社会的种种矛盾与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不仅是对现实的反映,更是对“可能世界”的一种探索。在认知诗学的视角下,“可能世界”是指“一种可以想象的事物状态的总和,它既可以指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实世界,也可以指……其他世界”^①。契诃夫通过作品构建了一个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让读者在其中感受到知识分子的挣扎与追求。知识分子群体不仅是故事的主角,更是时代精神的代言人。从《草原》到中期的代表作《第六病室》,契诃夫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生动

^① 熊沐清:《认知诗学的“可能世界理论”与〈慈悲〉的多重主题》,《当代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

描绘了俄国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阶段所经历的心路历程与生存状态。

1 契诃夫的知识分子主题与“可能世界”的构建

19 世纪中后期,知识分子主题逐渐在俄罗斯出现。自 1861 年废除农奴制和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后,市民形象和“新人”逐渐代替贵族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主角。这一时期的平民知识分子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背景,创作出了一系列融合自身境遇的知识分子形象。“当时每一个小市民,特别是知识分子,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谋取功名显达的搏斗。抓权和致富的机会诱惑着他们,大街闹市和富家生活方式的豪华气派吸引着他们。”^①处于社会中间阶层的平民知识分子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尴尬境地中,既无法改变腐朽的社会现状,也无法帮助底层贫苦农民摆脱艰苦生活。

同样,契诃夫作品中也有许多对知识分子的描写,这一创作倾向背后有多重原因。首先,他生活在 19 世纪末的俄国,那是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成为社会变迁的晴雨表。他们面对社会的动荡、政局的腐败和人民的疾苦,往往展现出深刻的思考和探索。其次,契诃夫本人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他的医学背景和社会实践活动让他能够深入观察和理解这一群体的内心世界,这种个人经历与创作理念相互融合,使得知识分子成为他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再者,俄国文学有着悠久的描写知识分子传统的历史,契诃夫作为这一传统的继承者,也自觉地将知识分子作为自己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

在契诃夫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多个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例如,《没意思的故事》中的斯杰班内奇,他是一位医学老教授,但晚年却感到精神空虚,生活失去了意义,这一形象深刻揭示了知识分子在精神追求上的困境和迷茫。《套中人》中的别里科夫,则是一个害怕变革、墨守成规的典型,他将自己紧紧束缚在旧有的观念和制度之中,契诃夫通过这一形象讽刺了那些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的知识分子,同时也展示了社会变革时期人们的恐惧和不安。而《新娘》中的娜佳,则是一位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年轻女性知识分子,她对婚姻和未来的迷茫与不安,以及最终选择逃离婚姻、追求自由和独立的决定,不仅展现了女性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

^① 孔朝晖:《契诃夫对 19 世纪末期俄国市民阶层的批判》,《俄罗斯文艺》2022 年第 4 期。

女性地位和价值的忽视和压抑。这些知识分子既有着对理想的追求，又面临着现实的束缚，这种矛盾与挣扎构成了他作品中的“可能世界”。这些“可能世界”所展示的情节和人物状态，不会使读者感受到虚假和幻想，反而带着一些非虚构性的真实，引导读者从这些故事中反观现实世界，在想象中感受到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与生存困境。同时，他也通过这个“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对比，揭示了社会的种种矛盾与不公。

2 从《草原》到《第六病室》的情节连续性所展现的“可能世界”

契诃夫从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创作，前期作品以幽默、讽刺为主，但文学性较弱。经过十余年的打磨，28岁的契诃夫回到他的家乡塔甘罗格，进行了一场为期两个月的漫游，在顿涅茨克大草原游历的经历，为他带来了创作灵感。1888年，契诃夫创作的《草原》是根据自己童年乘车穿过草原去探望祖父的经历，并结合这次草原旅行而创作出来的。这部作品展现了9岁的孩子叶戈鲁什卡被母亲要求去遥远的地方求学，在舅舅伊万·伊万内奇·库兹米乔夫和同行的神甫赫利斯托福尔·西里斯基的陪伴下，见证了草原上当地人的生活，经历了草原的烈日、暴雨，在运羊毛的车上越发感到孤独和迷茫的故事。作品以孩子的视角展示了对不确定的未来的恐惧。

两年后的1890年4月至12月，契诃夫前往远东地区的库页岛，调查被关押和安置在那的苦役犯和移民的生活状况和健康情况。在这次经历后，1892年契诃夫创作了《第六病室》。《第六病室》的两位主人公分别是在精神病院被关了十几年的伊万·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和城里医院的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伊万患有被迫害妄想症，认为与他接触的所有人都是带着阴险目的的间谍和密探。而安德烈曾经是一名称职的医生，但在日复一日的行医中感到厌倦，虽然仍热爱医学，但对问诊变得敷衍了事。因为即使再努力，城市中的死亡率也从不见减少，医院的环境也从未得到改善，自觉努力无用的安德烈心灰意懒，认为对这些穷人来说：“生点病有什么关系？反正他们的生活根本没有什么内容，再要没有痛苦，就会完全空虚，跟阿米巴的生活一样了。”^①第六病室里犹太人莫依谢依卡的一次乞讨，使安德烈注意到了伊万对

^① 本处与下文所有《第六病室》原文均出自契诃夫著，汝龙译《孩子集》。本处出自第80页。下文相关引文以随文夹注方式标出。〔俄〕契诃夫：《孩子集》，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

他的敌意和讽刺，他好脾气地与伊万互动。在这一阶段，被视为疯子的伊万和成功人士安德烈展开了细致的交谈，安德烈对这位被视为疯子的天才十分欣赏，可这种欣赏在其他“正常人”看来无疑是不正确的，他们认为这位医生正在被同化为一位疯子。为了让安德烈恢复正常，他曾经的好友，邮局局长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与他一起进行了一场旅行，这场旅行更让安德烈感觉到了所谓“正常人”的荒谬和世界的无趣，这反而使他更讨厌这种庸俗的生活，最终在折磨下厉声控诉不被理解的心情，但结果是他被关入第六病室，在绝望中中风死去。

两部小说虽然在不同的地点展开，也没有出现相同的角色，但这两部小说仍有明显的情节延续性。从表象上看，二者似乎是完全不同的。《草原》以线性叙事的方式展示了9岁的孩子叶戈鲁什卡从家到另一座城市读书，一路上经过草原的旅程，途中经过的也都是纯粹的乡村图景。而《第六病室》则是由第六病室为中心点向外辐射，展示了主人公安德烈、伊万以及其他相关人物的故事，展示的是城市中的小市民的生活。但仅仅观察表象上的不同并不足以理解其中的内在联系。背景是为主人公的经历服务的，过草原求学与在城市发疯直到死去的经历，对应了俄国知识分子的一生。

从《草原》到《第六病室》虽然展示的是不同地区不同阶级的人的生活，但实际上是俄国平民知识分子一生的写照，他们作为既不属于农民商人，又不属于上层权贵阶级的“中间阶级”，一生始终处在矛盾的交会点。《草原》里的小男孩叶戈鲁什卡，对应着即将开始身份转型的平民知识分子阶级。叶戈鲁什卡的父亲作为一位十品文官，虽然官职不高，但这份公职赋予了他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尊严，使得家庭在小镇上能够保持一种相对体面的生活。然而，这种体面更多是精神层面的，物质上并不富裕。而在他父亲去世后，母亲奥莉迦·伊万诺芙娜“喜欢念过书的人和上流社会，托她兄弟出外卖羊毛的时候顺便带着叶戈鲁什卡一路去，送他上学”^①（《孩子集》）。这才使叶戈鲁什卡踏上求学之旅。旅途中，舅舅库兹米乔夫的商人身份成为叶戈鲁什卡眼中“另一种生活”的象征。库兹米乔夫言谈间流露出的对金钱的敏锐和追求，以及他因财富而获得的自由与影响力，让叶戈鲁什卡第一次直观感受到金钱与阶级之间的

① 本处与下文《草原》原文均出自契诃夫《镜子集》，汝龙译。本处出自《镜子集》第150页。下文采用随文夹注方式标注。〔俄〕契诃夫：《镜子集》，汝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紧密联系。这种现实与父亲清贫生活的对比，让叶戈鲁什卡开始思考，除了知识外，财富也是实现阶级跨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外，旅途中遇到的客栈老板等人物，他们的言行举止无一不在强化着叶戈鲁什卡对阶级差异的感知。神甫的威严与尊贵，客栈老板对顾客的等级划分，都让他深刻体会到不同阶级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尤其是当这些人物不经意间流露出对“低等人”的轻视或轻蔑时，叶戈鲁什卡内心的敏感与自尊被深深刺痛。他开始理解，自己作为平民知识分子的后代，既拥有改变命运的希望，也背负着沉重的阶级包袱。这种矛盾与挣扎，成为他成长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预示着他未来在面对社会现实时将面临的种种挑战与抉择。

而《第六病室》里的两位主人公就像小叶戈鲁什卡长大后所进行的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文本世界在此刻一分为二，展示了平民知识分子长大后的两种可能性。不愿屈服于世俗成为一个异类，被人们看作疯子囚禁在精神病院中；或者软弱地选择妥协，浸泡在社会的泥潭中独善其身，对底层人民的苦难视而不见。

《第六病室》中的两位主人公的命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分支，伊万原本家境殷实，但大学时家里破产，伊万为了补贴家用辍学回家当教员，他诚恳地认为城市生活烦闷无聊：“一般人没有高尚的趣味，过着黯淡而毫无意义的生活，用强暴、粗鄙的放荡、伪善来使这生活添一点变化。”（《孩子集》，110）他对生活有更高要求和期盼，但真实世界却处处使他的希望落空。他在对社会的矛盾思考中作出预言：“凡是对别人的痛苦有职务上、业务上的关系的人，例如法官、警察、医师等，时候一长，由于习惯的力量，就会变得麻木不仁，即使有心，也不能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当事人；在这方面，他们跟在后院屠宰牛羊却看不见血的农民没有什么不同。”（《孩子集》，106）这份疯子的预言也确实在医生安德烈身上应验了。一开始安德烈到城里就职时，有心改变这个对病人健康有威胁的糟糕的医院，但知识分子特有的软弱又使他仅仅将对社会的不满停留在口头的抱怨中。“安德烈·叶菲梅奇十分喜爱智慧和正直，可是讲到在自己四周建立一种合理而正直的生活，他却缺乏毅力，缺乏信心来维护自己这种权利。”（《孩子集》，114）他们抨击这种畸形的社会，见证了农民与小市民的生存困境，却又缄默着成为维护社会现状的帮凶，在内心良知的呐喊和行动的沉默中，这些知识分子的最终归宿只有发疯和死亡。

虽然是两种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性格，但安德烈和伊万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使他

们二者可以被看作小叶戈鲁什卡长大后的两种可能。两人都自视为超越一般人的、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对城市的庸俗和愚蠢感到灰心丧气，都因为有自己的思想而在庸俗的群众中显得格格不入而受到当时世人的排斥。伊万——曾怀揣着改变社会、启迪民智的理想主义者，试图在茫茫人海中照亮一条通往理性与进步的道路。然而，现实的残酷与冷漠，加之他过于理想化的追求，让他在一次次的碰壁后，逐渐失去了与外界的有效沟通方式。最终，那份不被理解的孤独与绝望使他患上迫害症，将他推向第六病室，到达发疯的边缘。在那里，他或许找到了片刻的宁静，却也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光芒与力量。而安德烈则是一位更为内敛、深沉的思考者。他同样对周遭的愚昧与麻木感到痛心疾首，但他选择了一种更为隐忍和自省的方式去应对问题。作为一名医生，安德烈试图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人文关怀去影响身边的人，哪怕只是微小的改变。然而，时代的洪流无情地吞噬了他的努力，当他意识到个人的力量在庞大的社会机器面前是如此渺小时，那份无力感与挫败感也悄然侵蚀了他的内心。最终，伊万同样被送进了第六病室，那里成了他逃避现实、寻找内心平静的避风港。

两人虽路径不同，却殊途同归，进入第六病室不仅是他们身体上的囚禁，更是心灵上的一种隐喻——在这个充满偏见与冷漠的社会中，真正的思想与自由往往难以立足。他们的命运，仿佛是对小叶戈鲁什卡未来可能性的预演，警示着每一个怀揣理想的年轻人：在追求真理与自由的道路上，既要勇于抗争，也要学会在逆境中保持自我，不让心灵被世俗的尘埃蒙蔽，也不让自己在孤立无援的冷漠中崩溃。

《草原》与《第六病室》虽在主题与风格上各有侧重，但两者在人物塑造上展现的不仅有知识分子形象的呼应，更在于对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尤其是贫苦底层民众生活状态的深刻描绘。这些人物如同社会底层的基石，承载着无尽的艰辛与无奈，同时也映射出时代背景下的普遍人性，可以体现两部小说的连续性特征。在《草原》中，旅店老板莫伊谢·莫伊谢伊奇便是这类贫苦底层民众的典型代表。他生活在草原的边缘，经营着一家简陋的旅店，每日与过往的旅人打交道，生活虽不富裕，却以勤劳和善良维持着生计。他对上层社会的贵族老爷们怀有深深的敬畏之心，这种敬畏既源于长期等级制度下形成的心理惯性，也反映了社会阶层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莫伊谢伊奇的形象，是契诃夫对那个时代底层人民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他们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对更好的生活抱有朴素的向往，却又不得不屈服于现实的残酷。

而在《第六病室》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与莫伊谢伊奇完全对应的人物，但病

室中的许多病人，尤其是那些因贫困、疾病或社会边缘化而被迫进入其中的个体，这些底层贫苦民众的形象以更为复杂和隐晦的方式，在看守人尼基达以及第六病室中的其他病人如莫依谢依卡，以及其他普通病人身上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尼基达作为病室的看守，他或许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贫苦底层，但他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却与那些被囚禁的“病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待医生等体面人，他言听计从，谄媚赔笑，可面对他认为低自己一等的精神病人，尼基达就变成了一个只知道用拳头办事、打骂病人甚至抢夺病人东西的“掌权者”。欺软怕硬，见风使舵的底层看守之下，还有无所依傍、被囚禁在病房中的病人。犹太籍傻子莫依谢依卡天天上街乞讨，但所有讨到的东西都会被尼基达抢走，然后再被狠狠揍一顿。整个医院也都是这般混乱无序的，病人得不到救治，在肮脏的环境和医生的欺骗下渴望被治愈，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安德烈甚至在想：“生点病有什么关系？反正他们的生活根本没有什么内容，再要没有痛苦，就会完全空虚，跟阿米巴的生活一样了。”对痛苦中的病患不再上心。

因此，这两个既有连续性的故事情节，又有相似人物和社会阶级的故事可以被看作一个有机的共同体，展示了俄国知识分子一生的开端与结束。

3 从可能到现实：规训权力下的社会普遍惨案

在探讨“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会点时，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规训权力是如何在现实世界中运作，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社会观念和“可能世界”的。这里的“可能世界”指的并不是一种理想状态，而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真实又严峻的现象的展示。“现实世界”充满了各种权力的交织与冲突，尤其是规训权力的滥用，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维护了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压迫和剥削的工具。

《草原》所展示的知识分子的孤立无援和《第六病室》中所呈现的个人悲剧，不是个人对命运的顺从，而是社会规训下无法挣扎的必然结局。“可能世界”与“文本世界”的预言最终落实到现实世界，成为人们窥探现实的一只放大镜。从福柯的权力—话语角度来看，社会对个人的规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入每个人的脑海，以统治权为核心的权力体系在现代被解构，“微观权力”以隐蔽而广泛的形式渗透生活的每个部分。规训权力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检查机制三种方式，实现对社会的

控制和规范。^①福柯认为，规训权力是现代社会中最为重要和普遍的一种权力形式。他通过对监狱、学校、军队等机构的考察，揭示了规训权力在这些机构中的具体运作方式。福柯指出，规训权力是一种“沉默的暴力”，它通过各种看似合理、自然的规范和制度，将个体置于一种无形的束缚之中。这种束缚虽然不容易被人们察觉，却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的行为和思想。

在《草原》与《第六病室》中，规训权力以一种微妙而隐匿的方式悄然渗透，这种渗透首先在精心构建的空间布局中得以彰显。在《草原》中，尽管小叶戈鲁什卡的旅程似乎无垠地铺展在广袤的草原之上，象征着自由与无限可能。但实际上，他的体验却被限定在了马车这一狭小的空间之内。这辆马车，犹如一个微缩的社会舞台，成为规训权力运作的一个缩影，让人不禁思考：在追求自由与梦想的道路上，个体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挣脱既定框架的束缚，实现真正的自我超越？

这种空间上的规训在《第六病室》中的展现，达到了更加令人窒息的程度。小说《第六病室》中的核心意象，不仅仅是一个物理上的封闭空间，更是规训权力与精神压迫的极致体现。它仿佛是一个微缩的社会牢笼，将一群被视为“异类”的精神病人囚禁其中，剥夺了他们的自由与尊严。在这个病室里，每一寸空气都弥漫着绝望与无助的气息。医院的整体环境，作为病室存在的大背景，早已失去了救死扶伤的圣洁光辉，转而成为腐败、贪婪与冷漠的代名词。受贿成风，欺骗横行，这里不再是治愈疾病的港湾，而是人性堕落的深渊。而其中的第六病室，则如同深渊中的最暗处，它不仅是医院中最差的角落，更是社会偏见与冷漠的集中投射。病室内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规训的残酷。病人們的言行举止受到严格的监视与控制，他们的思想被束缚，情感被忽视，个性被磨灭。医生与护士，这些本应给予患者关怀与治疗的角色，却成为规训权力的执行者，他们的冷漠与忽视，加剧了病人們的痛苦与绝望。

“19 世纪后精神病学开始运用它的知识话语干预刑事案件。其实精神病学鉴定的患者，既不是司法裁定的罪犯，也不是医学诊断的病人，而是规范权力制造出的‘不正常的人’。”^②《第六病室》中的安德烈和伊万都是如此。在看到犯人被士兵押走后，

① 参见卢小龙《语言、权力和主体：福柯文学思想概观》中对话语权力的介绍。卢小龙：《语言、权力和主体：福柯文学思想概观》，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9 年。

② 卢小龙：《语言、权力和主体：福柯文学思想概观》，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9 年。

伊万突然产生了奇怪的感觉。“不知什么缘故，他忽然觉得他也可能被戴上镣铐，像那样走过泥地，被人押送到监狱里去。”（《镜子集》，90）伊万因此才患上了妄想症。社会的不安定使他发了疯，接受越多的知识，真正进入社会后反而会感到更加割裂，长期以来接受的知识和教育没有成为抵挡不安的解药，反而加深了伊万的迷茫。

在规训权力的视角下，《草原》中广袤无垠的草原不仅是未被严格社会规训影响的自然状态象征，更是叶戈鲁什卡内心世界的初露端倪。草原的天气由明媚转至暴风雨，恰似他内心从初涉世事的纯真兴奋，逐步过渡到面对等级森严、财富至上的社会现实时的迷茫、恐惧与孤独。这一过程中，叶戈鲁什卡目睹了神父转型商人的现实，感受到了来自贫民的“贵族”称谓背后的复杂情绪，以及社会普遍推崇的“知识改变命运”的规训力量。这些外部信息如同无形的枷锁，悄然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预示着他未来或将面临的精神挣扎与身份认同的困惑。当叶戈鲁什卡真正踏入社会后，他面临的不仅是个人成长的挑战，更是社会规训力量全面渗透的开始。《第六病室》中的两个极端形象——精神病人与医生，成为他潜在命运轨迹的隐喻。一方面，精神病人象征着在强大社会规训下，个体精神世界的崩溃与异化，是对抗无效后的极端表现；另一方面，医生则代表着社会规训的执行者与维护者，其看似理性的行为背后，往往隐藏着对个体独特性的忽视与压抑。

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走向，在规训权力的作用下导向了一个共同的结局：无论是叶戈鲁什卡未来可能成就的学者身份，还是他潜意识中可能滑向的精神困境，最终都可能被社会普遍接受的平庸价值观驯化，成为那个庞大社会机器中一颗失去自我、麻木运转的螺丝钉。对于那些不愿妥协、坚持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而言，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他们或许会发现，唯有通过某种形式的“死亡”——无论是物理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才能逃离这无尽的规训循环，保留一丝灵魂的纯净与自由。因此，契诃夫的作品不仅是对个体命运的深刻剖析，更是对社会规训力量下人性异化与抗争的深刻反思。

4 结语

在《草原》与《第六病室》中，契诃夫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社会规训权力对个体的控制与压迫。在《草原》中，叶戈鲁什卡在面对社会等级差异与成年人的恶意

时,逐渐产生了与普通民众的离间感。这种离间感在《第六病室》中则表现为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现实时的孤立无援与无力挣扎。安德烈与伊万分别代表了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规训权力时的两种不同态度。安德烈选择了妥协与放弃,而伊万则试图通过反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无论哪种态度,最终都未能摆脱社会规训权力的束缚与压迫。

在认知诗学的视角下,“可能世界”不仅是文本中构建的一个想象世界,更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体现。契诃夫通过作品构建了充满可能性的“可能世界”,让读者在其中感受到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与生存困境。同时,他也通过这个“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对比,揭示了社会的种种矛盾与不公,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压迫与束缚。这种反思与批判,不仅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俄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精神追求,也为我们思考当代知识分子的处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 董晓.在冷酷的微笑中体察生活的残酷真实——契诃夫的创作和对我们的启发[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3(1):1-6.
- [2] 孔朝晖.契诃夫对19世纪末期俄国市民阶层的批判[J].俄罗斯文艺,2022(4):60-72.
- [3] 李慧欣.19世纪50—60年代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新人”形象研究[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23.
- [4] 卢小龙.语言、权力和主体:福柯文学思想概观[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9.
- [5]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 [6] 倪稼民.颠覆·建构·话语失却:文化传统背景下的俄国知识分子与斯大林模式[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
- [7] 契诃夫.孩子集[M].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 [8] 契诃夫.镜子集[M].汝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 [9] 师蓉.“我四周有夏季和草原的气息”——《草原》(节选)导读[J].读写月报,2021(23):4-8.
- [10] 熊沐清.认知诗学的“可能世界理论”与《慈悲》的多重主题[J].当代外国文学,2011,32(4):11-23.
- [11] 袁圆.契诃夫小说《草原》中的作者形象分析[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9.